

《四庫全書總目·春秋地名考略》提要辨誤綜論*

張宗友**

<目次>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I. 崔、李、楊三家對《春秋地名考略》提要之辨誤 | III. 對《四庫全書總目辨誤》之商榷 |
| II. 胡玉縉、余嘉錫先生之辯證及補證 | IV. 餘論：在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辨誤中宜加注意的問題 |

清代是中國古代學術的整理時期，乾隆皇帝一手推動的《四庫全書》纂修工程，在學術史、文化史上影響極為深遠。作為這項工程的副產品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¹⁾在目錄分類、大小類序及提要之編纂方面，均能踵武前賢，後出轉精，垂範後世，實集中國古代目錄學之大成，堪稱進入古代中國學問世界的門徑之作²⁾。有關《四庫全書》種種問題之研究，成果豐碩，蔚為大觀，實已成為現代中國的一門顯學，即四庫學；其中又以對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之研究，堪稱大宗。如針對該目之失，前有胡玉縉、余嘉錫等大家，近有崔富

* 본 연구는 2012년 동국대 논문게재 장려금으로 이루어졌음.

** 東國大學校 中語中文科 教授.

- 1) 按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清永瑢等領修。常見的有中華書局本、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(臺灣：商務印書館，1986)等。該書為習見典籍，故本文引用，僅明卷數出處，不注頁碼。
- 2) 余嘉錫先生指出：“漢、唐目錄書盡亡，《提要》之作，前所未有，足為讀書之門徑，學者捨此，莫由問津。”(參其《四庫提要辨證·序錄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版，第51頁。)又說：“但欲求讀其書而知學問之門徑，亦惟《四庫提要》及張氏之《答問》差足以當之。”(參其《目錄學發微》卷一，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版，第18頁。)案：“《答問》”，指張之洞《書目答問》。

章、李裕民、楊武泉等先生，各有訂誤專著出版³⁾。雖然各家之側重有所不同，但對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之服膺與推崇，則毫無二致；且以客觀史實之考證為職志，其訂誤成果，均有裨實用。毋庸諱言，各家之辨證與考訂，亦非盡善盡美，尚不免有可議之處。本文將要討論的《春秋地名考略》提要，即為各家所共同關注，而各家之引據與考辨，又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，尚須進一步釐清與中論。這為我們認識四庫學的研究現狀，提供了一個較好的案例。

I. 崔、李、楊三家對《春秋地名考略》提要之辨誤

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二十九《春秋地名考略》提要云：

國朝高士奇撰。士奇字澹人，錢唐人，居於平湖。以諸生薦直內廷，授中書舍人，改翰林院侍講，官至內閣學士。是編乃康熙乙丑，士奇奉勅撰《春秋講義》，因考訂地理，併成是書奏進。據閻若璩《潛邱劄記》稱：“秀水徐勝敬可，為人作《左傳地名》訖，問余成公二年鞏之戰”云云，則實士奇倩勝代作也。

則館臣以為此書實高士奇使徐勝代作。對此，崔富章先生引《浙江採集遺書總錄》、陸惟燾《平湖經籍志》之記載，予以補正：

【按】《浙江採集遺書總錄》：“《春秋地名考》十四卷，刊本。右前人（高士奇）撰。援據各書，以證杜預原注，兼補其缺，所考最為詳核。按此書朱

3) 胡玉縉先生有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》(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,《春秋地名考略》條在第179頁), 崔富章先生有《四庫提要補正》(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,《春秋地名考略》條在第177頁), 李裕民先生有《四庫提要訂誤》(北京: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,《春秋地名考略》條在第17頁;中華書局2005年版(增訂本),該條在第26頁), 楊武泉先生有《四庫全書總目辨誤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,《春秋地名考略》條在第32~34頁)。

彝尊謂秀水徐善著，蓋當時借刻于江村(高士奇)，故今本署高名，後之論世者宜知之。”陸惟燾《平湖經籍志》：“徐敬可名善，秀水人；其侄勝力，名嘉炎，均以文著，《清史》有傳。《提要》中所引《潛邱劄記》，似誤合勝力、敬可爲一人；或‘勝’字乃‘善’字之誤歟？”

【按】是書爲浙江平湖徐善(敬可)受高士奇委托代撰，高士奇爲刻版負責人，與徐嘉炎(勝力)無涉，《提要》內兩“勝”字乃“善”字之誤。

李裕民先生核以《潛邱劄記》卷二之文，並引《嘉興府志》之記載，謂《提要》“誤上加誤”：

按：《潛邱札記》卷二作“秀水徐善敬可爲人撰《左傳地名》”，敬可爲徐善之字，勝力爲秀水人徐嘉炎之字，光緒《嘉興府志》卷五二有傳，勝力與敬可爲叔侄行，《提要》誤合勝力、敬可爲一人，又佚去“力”字，以爲此書爲徐勝所作，可謂誤上加誤矣。

崔、李二氏均指出此書作者乃是徐善，而非徐勝，可謂不約而同。然二氏之辨，亦有失察之處。崔先生所引朱彝尊觀點及《平湖經籍志》所載，已明徐善爲秀水人，卻在結論中謂其爲“平湖”人。按平湖與秀水，雖均爲嘉興府屬縣，卻並不相鄰(中間尚隔嘉善與嘉興二縣)。此或因涉《平湖經籍志》之書名而致失察。李先生以“勝力與敬可爲叔侄行”，後來楊武泉先生據《清史稿·徐嘉炎傳》及《楊李詩繫》卷二十八之記載，指出徐善(字敬可)爲徐嘉炎(字勝力)之叔，故李先生乃于增訂本中將該句改作“勝力爲敬可之侄”。

楊武泉先生在崔、李二先生考辨的基礎上，進行了較爲詳細的論證。其主要論據有三：甲、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二十九《春秋地理考實》提要稱“高士奇《春秋左傳地名考》”，以《地名考》爲高氏之作。這與《春秋地名考略》提要之表述，並不一致。乙、《潛邱劄記》卷二所載乃是徐善，而非徐勝。此係進一步申論作者問題。丙、《春秋地名考略》前所載朱彝尊序文，與朱彝尊《曝書亭集》卷三十四所載《春秋地名考序》，兩者在文本之後半段存在着明顯差異。爲明白起見，茲將楊先生所錄之文對照如次(標點並依

其舊)：

《春秋地名考略序》(《春秋地名考》前《原序》所附) ⁴⁾	《春秋地名考序》(朱彝尊《曝書亭集》卷三十四所載)
<p>今天子命儒臣編纂《春秋講義》，於是錢塘高學士充總裁官，既編成經進矣，又廣采方志，以餘力輯《春秋地名攷》十四卷，彝尊受而讀之，愛其考迹疆理，多所釐正，簡矣而能周，博矣而有要，無異聚米畫地，振衣而挈其領也。原《春秋》之作，孔子既取百二十國寶書筆削之，又別進職方。述職方者，所以輔《春秋》之不及爾。故夫學于《春秋》，非惟義疏序例、大夫之辭、公子之譜，皆宜究圖，而土地之名，尤其要焉者。有講義以正諸家之踏駁，不可無《地名考》以補方志之疏舛，若經之有緯，書之有正，必有攝也。彝尊嘗與學士同直南書房，既而以謫謫官，今老矣，於經義無所發明，序學士之書，幸託姓名傳諸後世，竊比于北宮、司馬諸子獲附見於《春秋》之傳焉。秀水朱彝尊序。</p>	<p>《地名考》一十四卷，吾鄉徐處士善所輯。予受而讀之，愛其考迹疆理，多所釐正，簡矣而能周，博矣而有要，無異聚米畫地，振衣而挈其領也。原《春秋》之作，孔子既取百二十國寶書筆削之，而又述職方以輔《春秋》之不及，則學夫《春秋》，非惟義疏序例、大夫之辭、公子之譜，皆宜究圖，而土地之名，補方志之疏舛，尤其要焉者。若經之有緯，書之有正，必有攝也。予老矣，恒媿經義無所發明，序其書竊比北宮、司馬諸子，獲附見於《春秋》之傳焉。</p>

楊先生據此申論云：“兩相比較，前者不提徐善，後者不提高士奇，而兩文基本內容相同。可知前者為逢迎高士奇學士，而後者為平居故交迎酬。”又以《春秋地名考略》卷一“召”條為據，指出：“徐善從《帝王世紀》之說，而《庫》本《考略》乃排《帝王世紀》之說者。如此則高士奇亦有改竄也。”

以上三家，所採資料各有側重，但均指出代高士奇作《春秋地名考》為

4) 《春秋地名考略》前《原序》共三篇(朱序為第二篇)，均無小標題。茲從楊先生所稱。

徐善。楊先生之辨誤，復能突破單純之文獻考證，對相關文本有更深層次的解讀。

II. 胡玉縉、余嘉錫先生之辯證及補證

綜上可知，《春秋地名考略》條提要問題之所在，乃在辨明代高士奇之作者究屬何人。其實，胡玉縉⁵⁾、余嘉錫⁶⁾兩位先生，對這一問題已有辨析，崔、李、楊三家似均未注意。胡先生指出：

案：《割記》作“徐善敬可爲人撰《春秋地名》”，張穆所爲《閻氏年譜》云：“勝當作善。撰《提要》者蓋誤合勝力、敬可爲一人”。玉縉案：勝力名嘉炎。又朱彝尊《曝書亭集》有《春秋地名考序》云：“《地名考》一十四卷，吾鄉徐處士善所輯。”

可見，胡先生據《閻氏年譜》及朱氏序文，實已指出其作者當爲徐善。

余嘉錫先生《四庫提要辨證》中並無《春秋地名考略》一條，這或許是崔、李、楊三家訂正本條時，均未提及該著之原因。實則余先生對該條提要，亦有發明，其辨證乃在《易論》條下。該條提要載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九：“國朝徐善撰。書首有沈廷勳序，稱爲南州徐敬可，則當爲南昌人，而善自署曰嘉禾。考朱彝尊《曝書亭集》，有徐敬可《左傳地名考序》，又閻若璩《潛邱割記》，亦稱秀水徐勝敬可，爲人作《左傳地名考》云云，其字與里貫皆合，惟名有異，未知爲一人二人也。”⁷⁾這正是四庫館臣未能區分徐

5) 胡玉縉(1859~1940)，字綏之，號許頤，江蘇吳縣人。與《四庫全書》有關的著述還有《續四庫提要三種》(吳格整理，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2年版)等。

6) 余嘉錫(1883~1955)，字季豫，湖南常德人。其著述除《四庫提要辨證》外，還有《目錄學發微》、《古書通例》等(據周祖謨、余淑宜《余嘉錫先生傳略》，載《余嘉錫文史論集》(長沙：岳麓出版社，1997年版)，第663-682頁)。

7)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此段文字有誤四：朱彝尊《曝書亭集》卷三十四作“《春秋地名考序》”，不作“《左傳地名考序》”；朱氏序中但稱“徐處士善”，不作“徐敬可”。

善、徐勝(力)二人之原因所在。余先生辨證云：

嘉錫按：考之《曝書亭集》卷三十四《春秋地名考序》云：“吾鄉徐處士善所輯。”又卷三十三，有《報徐敬可處士書一首》，亦論《地名考》事，則作《地名考》之徐敬可，實即徐善。卷三十四又有《徐氏四易序》云：“處士徐善敬可，著《四易》”云云，則其本人深於《易》學，益可見作《地名考》之徐善與作此《易》論者，確係一人。又卷四十五《書宋史張浚傳後》，文中“有徐秀才善敬可”之語，則其人當係諸生。觀《提要》所言，似不獨未考朱氏全集，且并《地名考序》，亦僅觀其標目，而未睹文中“徐處士善”之語矣。又考閻氏家刻本《潛邱劄記》卷三，徐勝實作徐善，《提要》所據，乃吳玉搢編刻本，故有其名有異之疑也。胡渭《易圖明辨》卷五云：“秀水徐善敬可，博覽精思，無所不通，而尤深於《易》，晚著書以發其蘊，有《天易》、《義易》、《商易》、《周易》。同縣朱太史彝尊名其書曰《徐氏四易》，而為之序。”梅文鼎《勿庵歷算書目》云：“《明史歷志》屬稿者，簡討錢塘吳志伊經，嘉禾徐敬可(善)、北平劉繼莊、毘陵楊道聲諸君子各有增定。”此皆徐氏之逸事，可以想見其為人。《提要》既不著其出處，《清史儒林傳》及江藩《漢學師承記》又均不為之立傳，遂使湮沒不彰，故詳考之如此。⁸⁾

余嘉錫先生廣羅朱彝尊《曝書亭集》之記載，細勘閻若璩《潛邱劄記》之版本，又引胡渭、梅文鼎之文，以見徐善之行事，可謂博徵約取，考辨精審，不愧大家。顯然，徐善既能增定《志稿》，則于史學必有所長，這為其精通《春秋》之學，提供了旁證。

余先生並未見到胡玉縉先生之考辨⁹⁾，故此條辨證，實獨出己意；且直接勘驗版本，與胡先生之轉據《年譜》，實可互相補充。然余先生行文，猶有古風，其引文僅撮取大要而已。惟上引梅文鼎之文，“簡討錢塘吳志伊

由下引余嘉錫先生考辨可知，閻若璩《潛邱劄記》中所稱乃“徐善”、“《左傳地名》”，而非“徐勝”、“《左傳地名考》”。

8) 余嘉錫：《四庫提要辨證》卷一，第23-24頁。標點亦從之。其中“善”字為小字注文，故筆者特以小括號標之。以下引文同。

9) 據吳格《續四庫提要三種·前言》可知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》直到1964年才得以刊行，而余先生1955年即已去世，故當未能獲睹。

經”，讀之不暢。檢梅氏《勿菴歷算書記》“明史歷志擬稿三卷”條，其文云：“《明史歷志》，屬稿者，簡討錢塘吳志伊(任臣)，總裁者，中丞湯潛菴(斌)先生也。潛菴歿後，史事總屬崑山，《志稿》經嘉禾徐敬可(善)、北平劉繼莊(獻廷)、毘陵楊道聲(文言)諸君子，各有增定，最後以屬山陰黃梨洲(宗羲)先生。”¹⁰⁾可知余先生所引，省去二十餘字，而節略不免過當，遂使“吳志伊經”，扞格難通。

余先生以《清史儒林傳》及《漢學師承記》不為徐善立傳，“遂使湮沒不彰”為憾。今檢群籍，則徐氏生平學行，尚能得其大概，用資補證。試略陳之如次：

朱彝尊《經義考》卷六十六有“徐氏善《四易》”條，下引朱氏本人之序云：“處士徐敬可著四《易》，一曰《天易》，二曰《義易》，三曰《商易》，四曰《周易》，凡三十卷。其於《圖》、《書》，博採諸家之論，而一本乎邵子、程子、張子及朱子之初說，謂反之則四象五行之位皆若柄鑿之不可合，從其舊則不惟位與數各當，因以推夫三《易》改演之原，《洪範》、大衍、律歷、運氣、太一、奇門之所自出，靡不犁然有據焉。乃或疑其與朱子晚年之說不協，夫《圖》之可為《書》，《書》之可為《圖》，朱子既言之矣，徐氏特因朱子之說而發揮之爾，亦何悖於朱子哉？”¹¹⁾又引高佑鉅之語曰：“敬可為贈太僕卿世淳之少子，早年棄諸生，博通經學，於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尤融貫。”

清初《易》學大家胡渭云：“敬可與余厚，向在京師，出以示余。其言《河圖》《洛書》，以劉牧得希夷之傳，而西山兩易殊可疑。余深以為然。僭作題辭，要不出此意。……歲庚午(1690)，與敬可讀書莫釐峰下，方且效一

10) 梅文鼎：《勿菴歷算書記》，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崑山指徐元文。《清史稿》本傳謂：“二十二年(1683)，以會推湖北按察使，坐所舉不實，鐫三秩調用。尋命專領史局。”(參趙爾巽等撰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縮印本，第9708頁。)湯斌之卒則在康熙二十六年(1687)。

11) 朱彝尊：《經義考》，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案：此序又收于《曝書亭集》卷三十四，題作《徐氏四易序》，文字微異。“徐敬可”，朱集原作“徐善敬可氏”。“邵子”，朱集原作“邵氏”。

得之慮，相與更定是書。而敬可尋以病歸，卒於家。吾欲言之，無以為質矣。……越七歲，為今丁丑(1697)，始成此五卷。追念舊好，歔歔者久之。嗟乎！郢人逝矣，誰與盡言？此嵇生所以致慨也。”¹²⁾

《樵李詩繫》¹³⁾卷二十八載徐善詩五題(凡九首)，所附小傳云：“善字敬可，秀水諸生，必達孫。詩律嚴整，有《藟谷遺藁》。”其中《寄曹秋岳司農》詩云：“使節臨荒外，旌門未可攀。駟駟輸互市，鴻雁款重關。百戰瘡痍在，千家涕淚斑。更堪頻水旱，甌脫繞蘭山。”頗道亂後民生之艱與友朋之思。

以上數則，可略明其治學及行事。《碑傳集》收有丁子復《徐處士善傳》¹⁴⁾，言其家世、生平及著述較備。據該《傳》可知，徐氏字敬可，號藟谷，又號冷然子，門人私謚曰孝靖先生；生于1631年，卒于1690年¹⁵⁾。明亡，其父徐世淳死節，母亦死于兵亂，故其奔走四方，以搜奇探奧為事；“後閉戶著述，經史百家，靡不淹貫通達”。著有《流寇紀年》、《莊子七篇》、《周髀密法會通》、《弧矢六宗》等，惜皆燼于火。晚邃于《易》，有《易論》六十四篇，又作《徐氏四易》，“抉擇精蘊，時發前人所未發”。所輯《春秋地名考》十四卷，《傳》稱：“朱太史竹垞為之序，今所傳高氏本是也。”由此條史料，可確定其原作者正為徐善。¹⁶⁾

12) 胡渭：《易圖明辨》卷五，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胡渭(1633~1714)，字拙明，號東樵，浙江德清人。

13) 沈季友撰，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秋岳，曹溶(1613~1685)字，亦秀水人。

14) 錢儀吉：《碑傳集》卷一百二十五，收入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》第九十三輯，臺灣：文海出版社，1966年版。徐善傳在第928冊5897-5898頁。

15) 江慶柏《清代人物生卒年表》(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5年版，第641頁)，據丁氏《傳》斷其生卒年為1631~1693。今案：丁《傳》稱其父死時，徐善年十一，又三年而明亡，故其生年為1631年無疑。《傳》又稱其“卒年六十”，則當卒于1690年，而非1693年。詳參筆者《徐善生卒年補訂》一文(載《文獻》2007年第3期，第80頁)。

16) 《浙江通志》(嵇曾筠等監修，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)卷一百七十九《文苑傳》謂徐善：“字敬可，嘉興人。棄科舉不治，從學施博。晚作《易論》及《徐氏四易》，……又為《春秋地名考》、《家傳》、《藟谷集》、《莊子注》、《周髀

綜上，徐善乃明之遺民(《碑傳集》將其歸為“逸民”一類)，學問廣博，淹及四部，尤擅《易》學與《春秋》之學，故能與胡渭往復質辨《易》義，撰寫《春秋地名考》。明清易代，徐氏奔走四方，曹溶、朱彝尊、徐乾學¹⁷⁾、胡渭等均與之交，其能得識高士奇，並為高氏藉重，當可想見。惟遍檢高氏(其生平仕履見下節)著述，竟無一處提及徐氏，或故有所諱也。

III. 對《四庫全書總目辨誤》之商榷

筆者經過覆按，以為楊武泉先生對《春秋地名考略》條提要之辨誤，除引文有誤外¹⁸⁾，其標點及申論(見前引)，均不無可商之處。由于標點牽涉到對文意之理解，申論關係到對朱彝尊學行之評價，均足以影響後人，故不揣淺陋，辨之如次：

1. 標點問題

《春秋地名考略序》一段，標點可商者有二句。

密法會通》、《弧矢六宗》、《疏容圓寶絲網》、《璇室洞詮》。”則其學較雜，兼及子部。光緒《嘉興府志》卷五十《文苑傳》，有《徐善傳》，係撮取《浙江通志》、《携李詩繫》及丁《傳》成文。(許瑤光修，吳仰賢等纂，清光緒元年刻本，收入《中國地方志集成》(浙江府縣志輯)(上海書店，1993年版，第13冊)第434頁。

17) 據尚小明《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》附表-1《徐乾學幕府》(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1999年版，第256頁)，徐善于康熙二十四年(1685)至二十九年(1690)入徐乾學幕。其時胡渭、閻若璩均在乾學幕中，諸人當能相交。然而該表著錄徐善生卒年為1634~1690。尚氏又有《清代士人游幕表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年版，第52-53頁)，卻推徐氏生卒年為1634~1691，且謂徐氏“1691年至1692年應納蘭相國之請舍館京師”，前後抵牾。

18) 楊先生所引《春秋地名考略序》一段，誤字有二。其一，“又別進職方”，原文作“又別述職方”。由下句“述職方者”可知，當以“述”字為是。其二，“故夫學于《春秋》”，原文“于”作“乎”，當據改。《春秋地名考》一段，據《曝書亭集》之《四部叢刊》本(據原刻本影印)及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知“則學夫《春秋》”，“夫”字亦當作“乎”字。

甲、“故夫學乎《春秋》，非惟義疏序例、大夫之辭、公子之譜，皆宜究圖，而土地之名，尤其要焉者。”按《春秋》類著作，以義疏、序例之作爲其大宗。自《三傳》以下，注疏、正義、集解之作，最爲繁富。序例之作，講究書法條例，著述亦豐。朱彝尊《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》（載《曝書亭集》卷三十四）有云：“以例說《春秋》，自漢儒始。”其下備列鄭衆以降以“例”冠名解《春秋》之作者，都三十餘家。朱氏《經義考》著錄歷代解經之作，其《春秋》部分即以此二類爲主。與此形成對比的是，探究“大夫之辭、公子之譜”者極少，而專攻“土地”者，僅有京相璠《春秋土地名》、鄭樵《春秋地名譜》、楊慎《春秋地名考》等寥寥數家。朱彝尊主張“說《春秋》者，必兼包乎郡國土地之目，而後可無憾焉”，頗具卓識，故對高士奇《春秋地名考略》之作，多有揄揚。就本句而論，語涉遞進，故“義疏序例、大夫之辭、公子之譜”，既有輕重之不同，則不當並列也明矣。

乙、“有講義以正諸家之踏駁，不可無《地名考》以補方志之疏舛，若經之有緯，書之有正，必有攝也。”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二十九《日講春秋解義》提要云：“謹案：是書爲聖祖仁皇帝經筵舊稿。世宗憲皇帝復加考論，乃編次成帙。”可見該書原爲康熙經筵舊稿，由雍正編次定本¹⁹。則“講義”二字，當屬專稱，以加書名號爲宜。且《講義》與《地名考》對舉，正與上文“義疏序例”、“大夫之辭、公子之譜”分承相應。朱彝尊擅詩、詞、古文，以文學名家，其書法之謹嚴，于此可窺一斑。當朱氏之世，該書僅爲講義而已，故其《經義考》御撰一類，不能著錄該書。又，“經”與“緯”、“正”與“攝”²⁰，對舉而成，故朱彝尊以二者作比，以見《地名考》與《講義》之關係，目的仍在強調《地名考》之重要；故“《書》之有正必有攝”，與“經之有緯”，並列

19) 案：該書雖托名康熙、雍正，其實乃出于高士奇等臣子之手，前引《春秋地名考略》提要已能明之。

20) “正”與“攝”是《尚書》學上的一對概念。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（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卷三注“典”云：“凡十五篇，正典二，攝十三。十一篇亡。”毛奇齡《古文尚書冤詞》（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卷二謂《釋文》所注，于“典”之外，“餘俱有正有攝，不解何義”。又引熊朋來語解云：“百篇註者，有正、攝之分。正者，有其義而正其名；攝者，無其名而附其義。”

成文，當作單句爲佳，不宜隔斷。“書”指《尚書》，屬專稱。

綜合以上討論，知此二句之標點宜作：“故夫學于《春秋》，非惟義疏、序例，大夫之辭、公子之譜，皆宜究圖，而土地之名，尤其要焉者。有《講義》以正諸家之踳駁，不可無《地名考》以補方志之疏舛，若經之有緯，《書》之有正必有攝也。”

2. 對朱彝尊的評價問題

楊先生敏銳地發現，《春秋地名考略》與《曝書亭集》所載朱氏序文，有所不同，遂以此爲證，推斷其書爲徐善代作。這一證證，頗爲堅實。但楊先生復據此加以申論，以爲二者存在差異的原因，乃在“前者爲逢迎高士奇學士，而後者爲平居故交迎酬”。這就超越了單純的文獻考證層次，涉及到人物品行之定性問題。顯然，如果“逢迎”之說屬實，則一代大家朱彝尊之學行，不無可議。然而細考朱、高二人之仕履與交遊，則知楊氏此說，實有未妥。

按朱彝尊(1629~1709)，字錫鬯，號竹垞，浙江秀水人，明太傅朱國祚曾孫。明亡後，曾參加抗清運動，與魏耕、顧炎武等結交；三十餘年內，落泊江湖，寄食多方。康熙十七年(1678)應徵博學鴻詞科，始入仕途。其後授翰林院檢討，充《明史》纂修官(1679)，充日講起居注官、典試江南(1681)，又召入南書房供奉，充《一統志》纂修官(1683)，頗受擢用。康熙二十三年(1684)被劾私携小胥入內廷抄書，因而被旨降一級，時人謂之“美貶”。直到康熙三十年(1691)年始得補原官，復于次年罷官。隨後即返鄉里居，不復出仕²¹⁾。故其實際居官之年，屈指可數²²⁾。蓋其本色乃是醉心經史與故國文物之儒士，與在宦海浮沉中始終不倒的高士奇，自有不同。

21) 其仕履參清楊謙所編《朱竹垞先生年譜》，附于楊氏所撰《曝書亭詩注》頁首，清木石居印本；朱桂孫、朱稻孫所撰《皇清欽授徵仕郎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祖考竹垞府君行述》，載《廣清碑傳集》卷五(錢仲聯主編，蘇州大學出版社，1999年版)第283-288頁；羅仲鼎、陳士彪所撰《朱彝尊年譜》，附于二氏所編之《朱彝尊詩詞選》(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版)第212-236頁。

22) 朱彝尊《日下舊聞序》自稱“謫居無事”，上述年譜中亦不見有任職記載，可見其謫居期間實未受任用。故其實際居官之年，不過六七載而已。

高士奇(1645~1703),字澹人,號江村,浙江錢塘人。在朱彝尊應徵之前,高氏已因明珠薦,入內廷供奉,授詹事府詹事,遷內閣中書。《清史稿》本傳載:“康熙十七年(1678),聖祖降諭,以士奇書寫密諭及纂輯講章、詩文,供奉有年,特賜表裏十四、銀五百。十九年(1680),復諭吏部優叙,授為額外翰林院侍講。尋補侍讀,充日講起居注官,遷右庶子。”²³⁾二人同非科班出身而得授翰林,又同為浙人,同充日講起居注官,故有所交往且敦誼不淺,允合情理。二人著作中,屢有體現。如康熙二十二年(1683),高士奇隨御駕巡山西,有憶朱氏詩云:“書壓牛腰趨紫禁,芹浮鳳藻采春池。此時應念檀廬客,好賦清涼扈從詩。”注:“時朱檢討彝尊移居禁垣,勸編修杜訥遣子歸河間應試,故念及之。”²⁴⁾首句即指朱彝尊,可見交誼之篤。又高氏序《菊圃集》²⁵⁾云:“頃同年朱竹垞復從宋刻《江湖集》中搜示四十七首”,以“同年”視朱氏;高氏序《日下舊聞》(參下引),又以“同年友”視朱氏:可謂尤見親近。

不僅如此,朱彝尊《日下舊聞》四十二卷的編撰,實受高士奇的啓發與相助。高氏序其書²⁶⁾云:“余自束髮來京師,凡城市巷陌旗亭茶社無不觀,近畿之山川寺觀無不游,人家之園圃亭榭與前代之廢館荒臺,無不過而問焉。……時集都下,欲著燕京一書垂示永久,補前人所未逮。……歲癸亥(1683),與同年友竹垞偕侍直廬,每言及此,慨焉興嘆。彈指五年,竹垞《日下舊聞》之書成,詳載山川、宮室、城市、郊坰、畿輔、邊障、戶版、風俗、物產,遐收彙集,可以資掌故,備採覽,使有班孟堅者出,當必取之為史家之一助也。”由此可見,高氏本有著京師地理之意,與朱氏志趣相契。四庫館臣謂:“蓋其時距明末僅四十年,前朝宦豎,存者猶多,士奇出入禁廷,得以詢訪。又久寓其旁,朝夕考校,故所記往往可據。朱彝尊《日下舊

23) 《清史稿》卷二百七十一,第10014-10017頁。

24) 高士奇:《扈從西巡日錄》一卷,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勸杜訥,高氏同事。

25) 高士奇:《菊圃集》卷首,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

26) 其序載于敏中等編《日下舊聞考》(北京古籍出版社,1983年版)第2578-2579頁。

聞》多採掇之。今奉詔考定彝尊之書，徵據詳明，纖悉必備，此編已在包括之中。”²⁷⁾可以想見的是，朱彝尊必定見到了高士奇的書稿，並在其允許下採入《日下舊聞》中。朱氏自稱其書“草創於丙寅(1686)之夏，錄成於丁卯之秋，開雕於冬，迄戊辰(1688)九月而竣”²⁸⁾，前後僅三年即告成，可謂神速。除朱氏本人之博學多識、治學精勤外，高士奇、徐乾學等人之襄助，亦為重要原因(徐氏為捐資刊刻)。其時朱氏謫居在京，高、徐等人之相助，或並非出于一時權勢之考慮。

又，朱彝尊在《春秋地名考序》中，對該書確有贊揚。然而序之為體，與提要等不同。作序多受人之托，故以褒揚為主。提要則多為評價某部著作之學術價值，故不能無所批評。如即就朱氏之《日下舊聞》而言，其自序中已稱：“所抄羣書，凡千四百餘種，慮觀者莫究其始，必分注於下，非以侈摭采之博也。昔衛正叔嘗纂《禮記集說》矣，其言病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為己出，而曰：‘他人著書，惟恐不出於己；予此編，惟恐不出於人。’彝尊不敏，竊取正叔之義，至旁及稗官小說百家二氏之書，或有未足盡信者，世之君子，毋以擇焉不精罪我，斯幸矣。”²⁹⁾而四庫館臣仍在《日下舊聞考》之提要中批評道：“原本所列古蹟，皆引據舊文，誇多務博，不能實驗其有無，不免傳聞訛舛，彼此互岐。”

朱彝尊既與高氏交善，則互相丐序以傳，允合情理。前引高士奇序《日下舊聞》，已贊該書為史家之助，復論云：

竹垞博極群書，晝則歷郊野，摩碑碣，問父老，斷字卮言，悉經掌錄；夕則篝燈散帙，馳騁古今，務使聞見兩無所憾而後愉快。故其書大無不該，細無不析。竹垞猶未敢自居於作者，曰吾述舊聞而已。竹垞遭際盛時，優游纂紀，成不朽之業，副在名山。視《三輔黃圖》、《西京雜記》諸書，蓋又遠勝

27)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七十高士奇《金齋退食筆記》一卷條提要。“詢”，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誤作“詢”字。

28) 載《日下舊聞考》，第2581-2582頁。該序又載《曝書亭集》卷三十五。

29) 衛正叔，即衛湜，字正叔，吳郡人。《經義考》卷一百四十二有其《禮記集說》一百六十卷，並採其自序。“予此編”，《經義考》作“予之此編”。

之矣。

朱彝尊又有《江村銷夏錄序》³⁰，云：

錢唐高詹事退居柘湖，撰《江村銷夏錄》三卷，於古人書畫真蹟，爲卷爲軸，爲箋爲絹，必謹識其尺度、廣狹、斷續，及印記之多寡，跋尾之先後，而間以己意折衷甄綜之。評書畫者，至此而大備焉。今之作僞者，未嘗不做尺度爲之，然或割裂跋尾印記，移真者附于僞，而以僞者裸于真。自詹事之書出，稍損益之不可，雖有大駟鉅狡伎，將安施哉！……

細繹上引各條朱、高二氏序文，可知高氏對朱氏之褒揚，似猶勝于朱氏對高氏之贊賞。如必以其時朱氏遭謫而處卑，其序中褒揚之詞爲“逢迎權要”而作，則何以解釋高氏對朱氏之褒揚哉！可知友朋互丐之序文，尚未足以爲必然逢迎權貴之證據。

此外，《四庫全書總目辨誤》又謂“高士奇亦有改竄”。其實，此書雖出于徐善代撰，而總其事者則是高士奇，他對該書有所修訂，理宜固然。高氏雖然官聲不佳，“屢遭彈劾，聖祖曲予保全”（《清史稿》本傳），但其人並非不學無術，而是頗具學養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載其著述有九種之多，《春秋》方面著作除《春秋地名考》外，尚有《左傳姓名考》四卷、《左傳紀事本末》五十四卷二種。雖然並非盡其手定，但出于高氏之意旨則無疑。康熙曾贊之云：“得士奇，始知學問門徑。”“士奇得古人詩文，一覽即知其時代。”（《清史稿》本傳）康熙作爲一代雄主，亦是博學之人，有所稱贊，當不虛發。由此看來，“改竄”之論，未宜輕發。

30) 此序載高士奇《江村銷夏錄》卷首（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，復載于《曝書亭集》卷三十五（此前尚有一段論書畫源流文字）。

IV. 餘論：在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辨誤中宜加注意的問題

以上我們對各家訂正《春秋地名考略》提要之說，加以補論或訂正。據此可知，在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之辨誤中，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，需加注意：

其一，採錄宜廣。學術如積薪，後來者必須要廣泛參考前人之成果，方能續有所成，考辨之作，尤需如此。崔富章、李裕民、楊武泉三家，似均未注意到胡玉縉先生、余嘉錫先生之辨誤。學者精力有限，所見資料必然有所局限。故對本條提要之考辨，筆者猶能採《經義考》、《浙江通志》、《碑傳集》等之材料，加以補論。

其二，引文宜詳。前輩學者引用文獻，常取其大意，或加節略。然若不細加覆按，則易生誤。余先生為一代考證大家，而引據時節略較多，致後人標點為難。是以引文當以詳盡為宜，如加節引，務須覆核。

其三，考辨宜細。既加考論，則于所用材料，宜加細讀，得其旨要，否則用以考辨，易致誤失。或因此故，崔先生有稱“平湖徐善”之失，楊先生有標點可商之處。

其四，立論宜慎。學者所長，各有專門，如僅據一端，輒加立論，則未免失察。楊先生以為朱彝尊“逢迎”高士奇之說，即未足服人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為學人必備之書，各家訂正之作亦在必觀之列，故筆者有所發現，敢加申論，俾能對學人之利用，有所幫助。未當之處，尚祈大雅正之。

< 參考文獻 >

永瑤等纂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)，1980年版；(臺灣：商務印書館)，1986年版。

- 余嘉錫, 《四庫提要辨證》(北京:中華書局), 1980年版。
- 余嘉錫, 《目錄學發微》(北京: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), 2004年版。
- 胡玉縉, 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》(上海:上海書店出版社), 1998年版。
- 崔富章, 《四庫提要補正》(杭州:杭州大學出版社), 1990年版。
- 李裕民, 《四庫提要訂誤》(北京:書目文獻出版社), 1990年版;(又增訂本, 中華書局), 2005年版。
- 楊武泉, 《四庫全書總目辨誤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), 2001年版。
- 胡玉縉, 《續四庫提要三種》(吳格整理本)(上海:上海書店出版社), 2002年版。
- 周祖謨、余淑宜, <余嘉錫先生傳略>, 載《余嘉錫文史論集》(長沙:岳麓出版社), 1997年版。
- 梅文鼎, 《勿菴歷算書記》(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)(臺灣:商務印書館), 1986年版。
- 趙爾巽等, 《清史稿》(縮印本)(北京:中華書局), 1998年版。
- 朱彝尊, 《經義考》(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)(臺灣:商務印書館), 1986年版。
- 朱彝尊, 《曝書亭集》, 《四部叢刊》影清原刊本。
- 胡渭, 《易圖明辨》(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)(臺灣:商務印書館), 1986年版。
- 沈季友, 《樵李詩繫》(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)(臺灣:商務印書館), 1986年版。
- 錢儀吉, 《碑傳集》, 載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》第九十三輯(臺灣:文海出版社), 1966年版。
- 江慶柏, 《清代人物生卒年表》(北京:人民文學出版社), 2005年版。
- 張宗友, <徐善生卒年補訂>, 載《文獻》, 2007年第3期。
- 稽曾筠等修, 《浙江通志》(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)(臺灣:商務印書館), 1986年版。
- 許瑤光修, 吳仰賢等纂, 《(光緒)嘉興府志》(清光緒元年刻本), 見《中國地

- 方志集成》(浙江府縣志輯)(上海：上海書店)，1993年版。
- 尚小明，〈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〉(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)，1999年版。
- 尚小明，〈清代士人游幕表〉(北京：中華書局)，2005年版。
- 陸德明，〈經典釋文〉(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)(臺灣：商務印書館)，1986年版。
- 毛奇齡，〈古文尚書冤詞〉(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)(臺灣：商務印書館)，1986年版。
- 楊謙，〈朱竹垞先生年譜〉，見楊氏所撰《曝書亭詩注》頁首，清木石居印本。
- 朱桂孫、朱稻孫，〈皇清欽授徵仕郎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祖考竹垞府君行述〉，載《廣清碑傳集》卷五，錢仲聯主編(蘇州大學出版社)，1999年版。
- 羅仲鼎、陳士彪，〈朱彝尊年譜〉，見二氏所編之《朱彝尊詩詞選》(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)，1989年版。
- 朱彝尊，〈日下舊聞序〉，載于敏中等編《欽定日下舊聞考》(北京古籍出版社)，1983年版。
- 高士奇，〈扈從西巡日錄〉(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)(臺灣：商務印書館)，1986年版。
- 高翥，〈菊磔集〉(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)(臺灣：商務印書館)，1986年版。
- 高士奇，〈江村銷夏錄〉(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)(臺灣：商務印書館)，1986年版。

<국문초록>

《四庫全書總目》은 청나라 때 만든 《四庫全書》의 추가설명 내용이다. 이 영역의 연구 성과는 매우 크다. 이후에 사고학(四庫學)의 핵심이 된다. 이 총 목록의 잘못된 부분에 대해 과거에는 胡玉縉、餘嘉錫 등 전

문가가 연구했고, 최근에는 崔富章、李裕民、楊武泉등이 오류를 지적하는 저서를 출판했다. 그 중 《春秋地名考略》의 작가문제는 사고관(四庫館)의 학자들이 분명히 판별하지 못했기 때문에, 각자 보는 바에 따라 이 저서의 진짜 작가는 서선(徐善)이라고 지적했다. 하지만 전문가들이 인용한 근거와 판단에 각각 부족한 부분이 있다. 본문은 이 문제에 대해 다시 논의해 부족한 부분을 보충하고, 사실(史實)을 밝히고, 구두점을 일일이 대조해, 朱彝尊학문과 품행에 대한 평가문제를 다시 조사했다. 마지막으로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의 착오를 정정하는 데 (1) 采錄宜廣(기록을 광범위하게 참고하고), (2) 引文宜詳(상세하게 문장을 인용하고), (3) 考辨宜細(세밀하게 고증해야 하고), (4) 立論宜慎(신중하게 결론을 내려야 한다)을 지적했다.

주제어 : 사고학(四庫學), 사고전서총목(《四庫全書總目》), 춘추지명고략(《春秋地名考略》), 주이존(朱彝尊), 고사기(高士奇), 서선(徐善)